



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  
蓝棣之 李复威 主编

# 我常常享受 一种孤独

获奖诗人诗歌选萃

蓝棣之 选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

——获奖诗人诗歌选萃

蓝棣之 李复威 主编

蓝棣之 选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60号

**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

——获奖诗人诗歌选萃

蓝棣之 李复威 主编

蓝棣之 选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194千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 500

---

ISBN 7-303-01744-5/I·123

定价：6.25 元

# 八十年代文学新潮

## 丛书总序

蓝棣之 李复威

1988年，我们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这套一共十本的文学丛书。丛书里的几本选本在1989年出版之后，受到热烈欢迎，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市场销售一空。两年多来，我们和出版社都不断收到各方面（包括海外图书公司）来函来电要求再版，热烈赞扬这套丛书的巨大价值。现在出版社根据社会的紧迫需求，果断决定重印、再版、充实完整这套丛书（增加到十二本），我们认为这是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件大事和好事，希望各界读者和批评界继续给予关怀和赐教。

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勇于试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和行动口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包括解放和发展作家、批评家的活力和积极性。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立足前十年，开拓后十年，建立长期行为规划；同样，当代文学和理论的创作与繁荣也要遵照这个精神去开拓。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同样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提高我们的勇气和胆量，才敢于睁开眼睛看看新时期文学的不可抹煞的成就（缺点、问题、失误、失败自然也在所难免），和敢于高瞻远瞩地开拓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辉未来。

“勇于创新，勇于试验”，可以说这话极好地描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的开拓精神，创新和试验是它的显著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初把我们主编的这套丛书取名为“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我们的目标是：从80年代文坛所发生的新潮流、新现象、新趋势、新走向、新热点、新试验、新经验、新成就里，挑选出那些积极的、富于成果的和有价值的作品，介绍给当世，借以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我们甚至还希望这套书成为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文科图书馆的必藏书，为有关的教学和研究提供第一手的客观的和活的材料。

新时期的文学是改革开放的文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它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坚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创新是对我们固有的传统的扬弃和革新，试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是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再进一步建立自己的独创性。我们这套丛书所选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这个问题，每本书的编选者序言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辩证的分析，既分析了借鉴和吸收带来的教益和启示，也分析了这个过程中的缺点和弊端。我们坚持反对“全盘西化”，同时也决不赞同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我们希望看到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文学伟大的优良传统里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时代的活力。

“文坛上出现的所谓思潮，每一次之所以发生，必是有其外在、内在的因素。一次思潮，真正的价值，应该是以其是否有创造和开拓为标准的。我们在使用长矛之时，希望有大刀的改进，但更希望有火药出现的突破。”（贾平凹：《在危机中获得新生》）我们当初在这套丛书之上冠以“新潮”一词，决不是要以此招摇过市，决不是要表明我们以新潮批评家自居，更不意味着我们对“新潮”陷入了盲目性。相反，我们自己很清醒。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

“趋时”和追风头，赶浪潮。我们深知当任何一种潮流被庸俗化或泛滥成灾之后，都会带来种种弊端和危机，显得非常可笑。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看好的今天，我们仍然想提醒当世，对于任何新潮流都要作辩证的和本质上的分析，新潮乍起之时，我们不应急于去做非此即彼的结论。“新”的东西，可能是进步的先兆，可能从中发现合理的、超前的、充满希望的因素。当然，“新”的东西也可能是沉渣泛起、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毫无疑问的是盲目地追随新潮或者人为地制造新潮，都是很可笑的，最终都会被历史抛弃。然而，我们强调，从事文学创作，比别的任何工作都需要有创新的勇气，尤其是有实验的权利。经过实验，取得了成功，应该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而如果实验证明此路不通，大家又都取得了共识，及时停下来不就行了吗？何况文艺创作和人类的一切创造文明的劳动一样，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不断拓展。人类的审美思维特征和规律，也要求文艺的色彩不断嬗变，不断丰富。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即使是有缺陷的、不成熟的新潮，也是值得肯定和受到欢迎的。我们要防止在嫩苗上跑马，新潮都是娇嫩脆弱的，哪里经得起跑马的无情又无道理的践踏呢？反传统的观念当然不足取。然而藉着“维护传统”的名义，束缚和阻碍文学进步和发展“左”的倾向，更值得我们警惕。已故毛泽东主席说过，人类总得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能总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当我们的某些刊物或报纸充斥着毫无新意的作品与文章时，创新和新潮引起人们的向往和思念，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西方学者哈罗德·罗森堡在《荒野之死》一书中说过：“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下死于荒野”。为此，我们提醒读者，请不要只从我们这套书中看取服装和行话，希望多多注意，一代人是怎样地承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

革的重负的，而不要陷入可怕的“死于荒野”的困境。我们希望我们主编的这套丛书，成为反思传统、总结历史、审视自身、开拓未来的一把钥匙。

新时期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个趋向，而且这两个趋向看来是相反的。一个趋向是一些诗歌、小说、戏剧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纯文学”趋向，避开对现实的干预，放弃呐喊，疏离时代和读者，侧重于发掘自我，表现人性，钻进象牙之塔，作品高深典雅，朦胧晦涩；另一个趋向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目标是占领不少小说因淡化生活而腾出来的那些空间，关注社会问题，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和参与意识。这样两个趋向，一个向内走，向内转；一个向外走，向外转。前者愈走愈深，后者愈走愈广。例如后朦胧诗就比朦胧诗更集中注意力于自我，更深深地走向内心深处，开掘无意识这块内心矿藏。“垮掉的一代”小说集中表现在生活底层挣扎抗争的某些城市青年精神深层的绝望态势，荒诞小说一方面试图揭示积淀在社会文化性格中的人的荒谬，同时又进一步进入了对人本体荒诞的探索。而报告文学则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上，选择那些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重大矛盾，时代重大景观，以及日常生活事件，反映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现实矛盾。纪实小说所反映的，是一个急剧变革、信息量大的时代，“长镜头”和“一百个人的十年”都意味着走向广阔的现实。

这种情况，看似背道而驰，分道扬镳，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相互促进。人的内心深处有民族文化精神的积淀，广阔的世界也都由作家个人的眼光视角而得以展示；从个人的内心深处可以打捞起历史的映影，从现实社会必然可以窥见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这两个趋势必将殊途同归，看来相反的发展趋向最终都将导致我们对于社会人生的整体把握。在高明作家的作品里，广度里有深度，深度里有广度；有了广度才能开掘得深，而有了深度也才能宏阔起来。新时期文学在这样两个不同方向的发展，表现为

文学发展新时期的张力，而这张力发出的是有希望、有内涵的信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一方面编选了荒诞小说，垮掉的一代小说，新潮散文和后朦胧诗等，另一方面，又编选了纪实小说和报告文学，乃至通俗文学。我们相信，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二重奏。我们认为这两个趋向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宽容，不要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二者都应得到充分的和积极的评价。

文学的历史既是主题、题材演进的历史，又是文体、形式、技巧和语言嬗变和试验的历史；既是作品内容方面的潮流变迁，也是形式技巧、创作方法方面潮流的变更。这实际上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层面，是一个东西的两个层次，而决不是两个东西。考虑到我国广大读者的通常习惯。为了广大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这套文学丛书除后朦胧诗、探索戏剧、新潮散文几本之外，大都主要是从题材内容的角度选编和取名的；这样取名还考虑到在新时期里文学批评家们也往往习惯更多地从这个角度思考文学问题：荒诞小说选，性恋小说选，垮掉的一代小说选都是如此，报告文学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纪实小说的“实”指的是“现实”二字。但是，我们想提请注意，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读者将从所选作品里，非常真实和明晰地看到当代文学在文体、形式、技巧和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潮流。

我们的阅读经验已经证明，只会读内容或只读内容，例如只读故事情节，不能说是读作品，那只是读作家的经验，而只有读完成了的内容，即“形式”，亦即作为艺术品的艺术时，我们才是真正读了作品，至少这才是完全地和内行地阅读了作品。西方有些批评家曾经从新的角度谈到“形式”问题，例如克莱夫·贝尔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苏珊·朗格说艺术是情感的形式，米·巴赫金说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地装饰已经找到的现成内容，而是第一次让人们找到和看见内容，借助艺术形式，作家将经常第一次看到生活所显示和暗示的东西。这里所说“形式”的概念，也就是新

批评所说“文学性”的概念。阅读文学丛书和文学作品，提高阅读欣赏和批评的水准，是不可忽视“形式”和文学性的。我们希望喜爱文学作品的读者，希望关注文学新潮的人们，多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

本丛书的特点，或者说我们的目标在于：从内容即从题材、主题、思想蕴涵方面读，是新的；而从文学性即形式、技巧、语言、文体方面读，也是新的，两个方面都富于创新意识、试验意识和创新成果。举例来说，性恋小说选里所收的小说，不仅在内容上与过去的言情或恋爱小说有了很大不同，它所写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文化和恋爱感情里的性意识，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描写恋爱感情，而且在小说的艺术结构和语言，尤其在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崭新的探索，从而使性恋小说即使在最普通的读者看来，也是对于过去种种言情小说的新开拓。新潮散文选里所收的作品，不仅在主题、题材和情调上有别于过去的散文，而且在追求散文的诗性特质，发掘哲理的方式，追求多重结构和多层次含义方面，都有很多创新。荒诞小说里所收作品，从内容上看，它们描写了积淀在社会文化性格和文化心态中的人的荒谬，揭示了人类的尴尬处境，而使人得到振奋；从形式上说，则运用了一系列荒诞手法，并且把内容上对人本体的探索与表现上对文体的探索结合起来。荒诞手法的运用，源于作家们试图以更深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忧患意识；黑色幽默的影响，变形手法的活用，支离破碎表现手法的有意推出，非理性的艺术眼光等，构成了荒诞小说艺术技巧的特征。“垮掉的一代”小说选里所收作品，从内容上看，它们描写某些城市青年的精神构成和思想空间，揭示他们信仰的被打碎和精神大堤的被冲垮（所谓“垮掉”），抒写他们在精神空间里的漂泊和逃避，对于过去历史的嘲弄和对于未来的寻找，以及在因信仰大厦倒塌而形成的瓦砾里存在着的感情危机。与此相联系，这类小说在艺术技巧上进行了诸多创新，例如在表现平庸世俗偏见时的揶揄技巧，表现矛盾病

苦时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表现杂乱思想时的拼凑手法和“渎神”式宣泄手段，这些创新技巧的文学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报告文学，在它的主题由人生问题、好人好事转向广阔巨大的社会问题和由歌颂转入批判的同时，在它的创作充满了更多的哲学性思考的同时，它的艺术技巧也有了大的变化。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不再使用小说的结构或手法，不再拘泥于写人物，不再带有散文化倾向，而是从全方位、多视角观察问题，以多学科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观察视角从事写作。这就使得报告文学由原来的文学、新闻合一，走向了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科学合一的道路，由“散文化”变为“学术化”。探索话剧在内涵上坚持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的同时，艺术手法和技巧上突破了长久以来中国话剧“一个问题，两方人物，三一律，四堵墙”的框架模式，从艺术结构和写意象征多方面，为话剧的发展提供了比过去开阔得多的艺术空间，戏剧观也得以更新了。新潮散文也是这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总之，文学的问题，不仅是写什么，而且是怎样写的问题。小说创作的问题，从叙事学的立场看，不仅是“故事”，而且是“话语”。1917年是本世纪文学理论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年里，年轻的俄国理论家谢洛夫斯基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作为技巧的艺术》。自那时起，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文学理论大量涌现，文学、阅读、批评等词的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倾向于将文学作品理解为一种形式结构。他们认为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艺术形式不仅仅是个别艺术家的癖好；形式是历史地由它们必须体现的“内容”决定的，它们随着内容本身的变化而经历变化、改造、毁坏和革命。他们不赞成说艺术形式仅仅是外加在动乱的历史内容上的一种技巧。他们说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他们说他们发现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印记明确地是文学

的，而不是某种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一种新形式的发现、明确和发展，其社会根源，在于一种内在需要，即集体心理要求的压力。因此，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联系。一个作家能够修改或翻新那些语言到什么程度，远非他的个人才能所决定。这取决于在那个历史关头，意识形态是否使得那些语言必须改变而又能够改变。我们并不把这些话奉为金科玉律，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理论很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新潮、文学形式的创造及其深刻根源，从而有助于读者阅读本丛书的各个选本，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当代文学作出恰当评价。

新潮文学不是没有缺点与危机的，有的甚至是不可忽略的，这些，每位编选者都在编选序言里指出来了，请读者顺便加以注意。这不仅是为了读者阅读，也是为了当代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例如，对于“垮掉的一代”小说作品，编选者即指出了其中部分作品里包涵着的病态倾向，嘲弄与玩世不恭，以及创作上的简单想象和夸张的伤感所带来的颓废情调。又例如对于荒诞小说，编选者也指出了价值虚无主义以及渗进创作意识中的荒诞感，应当引起注意。又例如对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编选者也指出了它的愈来愈明显的“非文学化”倾向，一些作品本身的学术性、思辨性掩盖了文学性，质胜于文，因而它们的创作存在着潜在危机。再例如，对于探索戏剧，编选者同样指出了它的某些创作，存在着赶时髦，因而产生内容与表现手法之间的游离，显得生硬等缺点。总之，我们对于新潮文学的态度，是历史的和辩证的。

最后，在这篇总序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说：80年代新潮文学的成就、价值、潜在危机和历史地位到底如何，归根到底是由历史决定的，或者说时间终究会出来说话。其实时间已经开始出来说话了。

1992年4月1日 于北京

## 选 编 者 序

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时期，新时期文学是创新和实验的文学，是开拓也是取得成果的文学。

80年代的文学创作，因其创新与实验的特征，因其富于活力和朝气，因而是年轻的文学。

然而年轻的文学并不能与年轻人的文学完全划等号：有的人很年轻，他的创作却很古老或者衰老；有的人年事已高，或已届中年，却写下了年轻的声音。

西方文学大师艾略特曾经认为文学是不会成其为历史的，优秀的文学创作永远都活在当代。如果这个观点多少有些道理，我们就更有理由从更高也更深刻的意义上来看待文学潮流的变迁。

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茂局面是由青、中、老几代作家共同创造的，他们各自从自己的起点开始，按照各自所理解的传统和反传统，进行艺术的探索、创新和实验。

我不想在这里提倡文学的相对主义，我并不想说所有作家的创作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有道理的，他们的价值都是等同的，我更不想在这时候还来提倡大锅饭、铁饭碗或铁交椅，看似公允，实则是在其中周旋讨好。

不能不看到，中年和老年两代作家对于中国80年代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即使是在诗这个历来传统认为属于青年的伊甸园里，中、老年两代诗人的优秀之作也使得古来“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理论变得过时了。

本书将所选中、老年两代诗人和新时期开始时年纪尚轻的朦胧诗人群中那些更富于艺术活力、艺术创新和实验的诗人三十家，介绍给海内外读者，希望与本丛书中的“后朦胧诗选”一书结合起来，为各界提供一个80年代诗坛富于活力和生命力的整体面貌。

本书所选的诗人对于诗的革新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80年代焕发出的活力和生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优秀作品至今犹有魅力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朦胧诗”做为一股强劲的诗潮出现，是80年代诗坛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它迅速地打开局面，开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本书里我们选了芒克、舒婷、顾城、林莽等的诗，读者将会从中具体领悟到“朦胧诗”创作上的一些特征。芒克是老资格的朦胧诗人，林莽也很早就在此之列，舒婷的诗雅俗共赏，顾城是天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创造者，他们的创作，诗坛都曾经有广泛的评价，我就不再细说了。

有兴味的是，80年代关于“朦胧诗”问题的旷日持久的论战，却是从在40年代已经享有诗名的诗坛前辈、本书的入选诗人杜运燮的一首《秋》引起的。这不仅说明“朦胧诗”是一个时代性的现象，而且也说明了某些前辈诗人在80年代的艺术动向。

所谓“朦胧诗”者，用西方的理论术语来表述，即象征主义和后期象征主义诗风，它与浪漫的和古典的诗不同，它的含义是呈现的、暗示的，深藏的、神秘的和富于内生命的，因而是朦胧甚至晦涩的。这对于当代过于明白和浅露的诗风自然是一个挑战性的冲击，但这种冲击显然有利于激发诗创作的活力和生命力。

我之所以说朦胧诗是一个时代性的文学现象，并非一批年轻人偶尔心血来潮的产物，是因为在“文革”中，在一些已经成名的诗人的创作中，已经出现了这种势头。据一份署名“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组”的文稿《十年浩劫期间的中国新诗》(1966—

1976)说，在这期间在全国各地仍然有十几位“转入地下”的诗人，以传抄、油印等方式，坚持创作；而这股稀少却强有力的新诗潜流，“直接或间接地孕育了1976年春天安门诗歌运动的火山爆发，从而导致新诗潮的崛起”。这篇文稿所列举的诗人有：流沙河、蔡其矫、绿原、牛汉、曾卓、穆旦、陈明远、舒婷等。而这些诗人，除穆旦于1976年逝世之外，其余诗人，都以自己在80年代更加有力的创作，推动了诗坛的进步。

再往深一层说，假如把“朦胧诗”视为20世纪的现代主义诗风，那么这种诗风在40年代初的西南联大（抗战大后方的昆明）即已经出现，而在40年代中后期就已形成流派，此乃我们现在称为“九叶诗派”的诗人群。而就是这群诗人，到新时期重新登上诗坛的时候，已经被年轻诗人视为老诗人了。然而，他们的诗仍有活力，仍具创意，比如郑敏的诗，就好像永远有一把年轻的声音。由于她意识到把生命调到高潮状态的重要性，同时又自觉破除种种理念的束缚，因而她的诗更深入地发掘了自己，同时也更真实地打捞了历史的映影。除开上文已述杜运燮、郑敏之外，本书还选入了九叶诗人王辛笛，请大家读读他在80年代的成熟而又有生气的诗吧。

当年的“七月诗派”诗人绿原、牛汉，在80年代诗坛上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在40年代，在烽火和战争中写过很重要的诗；在当代文学的新时期，他们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重要成果。尤其要指出，他们对于诗艺的探索是在二十多年生命炼狱体验之后进行的，因此，他们诗创作的深度和时代内涵，是可想而知了，这些都在本书选入的作品中有所体现。牛汉从卧佛的“得大自在”受到启发，潜心创作有份量的作品，《梦游》是一篇写了十年时间的诗，而且每梦游一次还要修改一次。后来他告诉我说这样太累了，不想改了，不能改了。但请注意这《梦游》是艺术品。它是艺术的虚构，并非医院的病人档案。

艾青是一位不拘一格的诗人，他命途多舛，道路坎坷，九死一生，他把这一切经历遭际内化为意识情绪，发而为诗，他在80年代，在70岁前后，攀上了他诗作的第二个高峰，他把这些诗叫做“归来的歌”。诗坛与读者热烈欢迎一个久被放逐的诗人归来，而归来之后他唱出了深沉的、富于激情而又有充分独创性的歌。艾青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诗坛的“王子”，是很有意思的；“王子”也者，是说他的诗年轻而富于魅力，而如果说他是诗坛的“国王”或“元老”，那就坏了。

蔡其矫是一位从延安走出来的诗人，他用生命来追求诗，他的诗的比喻来自他生命的深处。在他的创作中，一切景语都是情语，他平日生命体验的积淀，往往在旅途中无意之间转化为艺术作品。舒婷在自叙创作道路时谈到过他的帮助，很多年轻诗人向他学习诗的艺术，他创作量不大，然而影响很大。时代与人是他的诗的基本关注，然而他决不是写口号，写中心，他深知表现时代必要经历一番灵魂的冒险，走进神话深处去关注民间疾苦，用艺术的语言歌哭人世的辛酸。

李瑛的创作开辟了军人诗歌的道路，难得他几十年来一贯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始终充满活力。我难忘他的诚恳和谦逊。我曾经在一篇草草的短文中，在肯定他创作炉火纯青的前提下，顺便讲了几句缺点。看到我的文章后，他请小雨专门来看我，并在长时间的通话中抱歉我评的几首诗确是涵咏不够充分。难得有这样坦荡广阔的怀抱。

艾青唱归来的歌，而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则是“重放的鲜花”。这不仅是说他们50年代创作的充满才气和个性的作品得以平反昭雪，而且是说他们本人在80年代的创作就是重放的鲜花，同为新时期朝气勃勃的新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邵燕祥80年代前期在《诗刊》负责编辑工作期间，顶住种种压力，为年轻诗人们保驾护航，而他的诗创作，也愈益以其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简化

影响当世。流沙河也同样在80年代前期出任《星星诗刊》的编辑，他在这个时期的创作，十分成功地把他得之于社会现实体验的美的“回忆”转化为诗，出之以婉转的炉火纯青的幽默风格，因此，他那些写自己一家在“文革”中命运的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了，这对于诗坛是很有启发的。公刘的诗创作也在80年代硕果累累，而且不断对自己有所突破与超越，他的诗读起来总是沉甸甸的，有份量的，不可不重视。

一批如今刚刚跨过青年诗人的年龄，而在80年代成长起来并取得丰硕创作成果的诗人，例如李小雨、韩作荣、周涛、昌耀（他年龄大一些）、叶文福、傅天琳、梅绍静、晓桦等，对于诗坛显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正在增加。李小雨的诗在80年代后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表现出对于诗歌艺术不断的创新和探索。韩作荣在80年代后半期的诗的变化发展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一些手法技巧以提高自己的表现力。昌耀是一个情况有些特殊的诗人，然而新颖性毫无疑问是他追求的一个目标，不断地创新使得他的诗终于不可淹没。周涛与晓桦都有一股真诚的难得的阳刚之气，李晓桦的诗在几年之内迅速取得成就，《巨鹰》那样的作品是新的，同时又是很深奥的，但却来源于他的体验。他们二位的诗有一种正气，与才气交织在一起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傅天琳诗的变化更让人惊异，转瞬之间，他的艺术风格就面目全非了，读者只要比较一下诗集《红草莓》与诗集《绿色的音符》就够了。

伊蕾的爱情诗几年来为一些有教养的人所注意，也招来一些人的信口议论。她的情诗里有真情，有真实体验，而且她擅长于把日常体验转化为艺术真实。爱情诗是个很难创新的题目，而她的诗每首读去都有新意，断不会与别人雷同或重复。一些寻常意象，在她笔下变得有了新的魅力。我在一次讲课时顺便说起伊蕾就算得大陆的女权主义诗人了，没想到在下面听课的有一位女博

士、香港女权主义学者，她提问说伊蕾对爱情还抱有希望，怎么能说是女权主义？在北京一次诗歌酒会上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伊蕾，她稍加思索，然后说：我写的是绝望后的希望，在以生命来追求最后一次希望。伊蕾在诗的道路上朝气蓬勃，善于学习，她在一本赠批评家的书上题辞：“你是新鲜的雷雨/震动了我语言的世界”，这句话有助于理解她的创作，算得是一次精彩的创作自述。

陈明远和任洪渊、刘湛秋从年龄上说，比韩作荣、李小雨、伊蕾他们要大一些，但他们的诗作同样表现出非常求新的锐气和探索的精神。陈明远的诗曾得到郭沫若、田汉、宗白华、赵朴初的赞赏，由于他在国外的时候多，与国内诗歌界交流就少了，但他是一个真肯下功夫的人，他的诗创意是很多的。他的新体旧体都写得不错，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存放着他在1976“四五”运动的诗歌，而他的旧体诗词曾经在1966年被误作“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在大江南北传抄翻印，他还因此罹难。刘湛秋童心不灭，加以性格的流动，他的诗是清新、潇洒而又富于生命体验的。任洪渊的创作是很前卫的，他的创作立脚于人的三个悲剧性冲突：生命／文化，时间／空间，今天／历史；诗人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语言的叛乱与征服，克服这些个悲剧性冲突，从而把生命、短暂与今天推向新的阶段。

以上，我挂一漏万地叙述了一下80年代诗坛上中年、老年诗人的活动情况和成果，朦胧诗人群也包括在其中了，希望有助于全面地了解新时期的文学面貌。遗珠之憾，自然在所难免，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以便日后修改或补充。

在这里，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的，就是我在本书中尽可能选入长诗和组诗。长诗和组诗当然更能代表诗人的创作水平和创作成就。从读者来说，也请恕我说一句大不恭的话：能读长诗与组诗者，才是高雅和更有素养的诗歌读者。但是长诗和组诗一定要